

William T. Rowe, *Speaking of Profit: Bao Shichen and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230pp.

王學深\*

近年來清史學界將更多的目光集中在十八世紀盛世，以及十九世紀下半葉自強與求富改革的研究中，卻鮮少關注處於兩者之間的十九世紀上半葉社會變革。自曼素恩（Susan Mann）和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劍橋中國史·晚清史》發表〈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一文後，<sup>1</sup>學界長期忽視對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研究。正因如此，羅威廉（William T. Rowe）認為，作為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嘉慶朝應該獲得更多的關注。他的新著《言利：包世臣與十九世紀中國改革》一書，集中討論了以包世臣（1775-1855）為代表的十九世紀上半葉改革思潮，同時也是近年來海外清史學界逐漸興起的「乾嘉變革」（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議題內的又一重要著作。

《言利》一書以總論部分統領全書，下分七章。第一章以「方向」為題，描述了包世臣早年的生平、求學經歷與著作，尤其是他所受的教育背景（常州學派與顧炎武影響），白蓮教叛亂下的社會環境與他「經世致用」的思想密切聯繫。在接下來的數章中，作者闡述包世臣的思想如何逐漸具體化，並付諸實踐。第二章以《說儲》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包世臣在這部近乎「烏托邦」式

---

\*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專業博士

<sup>1</sup> Susan Mann Jones, Phili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7-162.

的改革著作中，全面論述自己的改革思想，尤其是對於行政體制改革的設想。在中央方面，包世臣主張以左右宰相統領國政、內閣與文武官員；在省府層級，取消總督與巡撫制，以藩司和臬司代之，維持省府運轉；在地方層級，取消道臺和幕僚，恢復保甲制，以知府——知縣二級制維繫地方有效和廉潔的統治。第三章，作者關注包世臣的農政思想，並集中敘述三個方面：一、強調經濟有效性與農業的高產；二、財政改革與農業人口負擔；三、強調「國計」的重要性。第四章，作者聚焦在包世臣對貢米制度的改革問題之上，特別是包世臣以海運代替漕運的建議，代表了變革與創新在這一時期的重要性。第五章，作者以包世臣對兩淮鹽政改革為切入點，說明他雖然只是間接參與改革，其建議也未被陶澍採納，但他卻非常關心這個「國計民生」問題。包世臣主張改變政府授權特權商人的壟斷狀況，強調私人鹽業模式是最有效的分配辦法。不過，他既反對政府完全管控，也不贊成絕對的自由鹽業貿易。第六章以貨幣為題，集中論述了在道光朝「銀貴錢輕」的大蕭條時期，包世臣對於貨幣的改革建議。包世臣贊同使用紙幣，但堅持保留銀本位制度，並反對採用大錢制。這些他對王鑾改革建議的回應，展現出包世臣財政改革思想的多面性。最後一章，作者更是直接以「言利」為題，論證「求利」的目的是為了「民富國強」，再一次強調，包世臣認為私人商業模式或私有經濟對達到這一目標的重要性。

雖然羅威廉的研究較集中在包世臣的改革思想和實踐方面，但實際上作者在開篇已自行將本書納入三大脈絡內：一、乾嘉變革；二、嘉慶革新；三、十九世紀上半葉士人經世致用的努力。在乾嘉變革的框架下，作者提及嘉慶時期被視為政治權力從中央向地方精英轉移的關鍵期（頁 5），而這一點也構成包世臣發揮其改革能動性的大背景。在關於嘉慶革新的論斷中，作者同意嘉慶帝為挽救政權所作出的一系列改革努力，但在論述這一時期是否應被視作「維新」（restoration）時，作者用了問號（「？」）以表達謹慎的態度（頁 6）。最後，有關士人經世致用的論述，作者側重以包世臣為代表的改革士人，如何以「專家」的身分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影響政府施政，而這種能動性被稱為士人的「改

革主義」(reformism)。進而言之，以上三大脈絡也正是包世臣所處時代的三大關鍵議題，故而值得對它們展開進一步論述。

第一，乾嘉變革。十九世紀上半葉，清帝國面臨一系列的危機。盛世過後，諸多問題逐漸顯現，如吏治腐敗與行政效率低下，人口壓力與食物短缺，環境惡化與基礎建設停滯，水利系統的維護衰退與洪水壓力的陡增，內部叛亂與西方挑戰。而嘉慶時期被視為十八世紀轉向十九世紀的重要時期，也是朝廷控制力衰退、地方精英能動性增強的時代，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時期。因此，關注乾嘉變革的研究，以及嘉慶時期為應對危機做出的努力，對於我們更全面地瞭解清史，具有重要意義。

羅威廉在 2011 年發表的〈乾嘉變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一文，<sup>2</sup>再次引發了學界對於十九世紀的關注與思考。羅威廉關注的焦點在於通過研究「乾嘉之變」，回答清朝統治者如何讓清帝國在盛世之後回歸正軌，使其又成功統治一百年的議題。究其核心，這種變革是以嘉慶帝為代表的朝廷在盛世之後轉變統治策略，希望以一種彈性的統治模式，改變雍正、乾隆時期較為激進的統治策略，使朝廷觸手逐漸從地方回縮，從而有效且經濟地維護統治。對這一課題的研究，以韓承賢 (Seunghyun Han) 近期所著《盛世之後：十九世紀初期蘇州的國家與精英》為代表。<sup>3</sup>實際上，乾嘉變革代表朝廷統治策略轉型，精英階層能動性增強，傳統社會階層變動的轉折期。此時期為清代政策的前後分野，地方精英更為積極地加入地方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由此清朝從盛清時期的國家能動主義 (state-activism) 轉向晚清的地方精英能動主義 (elite-activism)。<sup>4</sup>羅

<sup>2</sup> William T. Rowe,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32, No.2 (Dec., 2011), pp. 74-88. 中譯本：羅威廉，〈乾嘉變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清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頁 150-156。

<sup>3</sup> Seunghyun Han, *After the Prosperous Age: State and Elite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u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參見王學深，〈評 Seunghyun Han, *After the Prosperous Age: State and Elite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uzhou* (韓承賢，〈盛世之後：十九世紀初蘇州地方士紳與國家〉)〉，《漢學研究》，卷 35 期 1 (2017 年 3 月)，頁 321-326。

<sup>4</sup> Wensheng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Crisis and Reform in the Qing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01.

威廉通過對包世臣思想的研究，展現了十九世紀初期士人（如包世臣、魏源、陶澍等）的努力，他們呼籲朝廷部分放權給地方、努力實現商業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同一時期，也是商人階層和專業型技術官僚向傳統文化型精英發起挑戰的時代。

第二，嘉慶革新。嘉慶四年（1799）國子監祭酒法式善（1753-1813）上疏言事，奏摺「首即有親政維新之語」，但卻被嘉慶帝批以「試思朕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率循舊章，恆恐不及，有何維新之處！」<sup>5</sup>雖然嘉慶帝自身並不認同「維新改革」的說法，但是他初期的一系列舉措，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咸與維新」的作用。如誅除和坤，軟化處理洪亮吉，重新判定曹錫寶案，廣開言路，改組軍機處，加強奏摺效率，選用並拔擢翰林院具有經世思想的漢人官員等。在昭槿（1776-1833）所著的《嘯亭雜錄》中就有以下記錄：「今上（嘉慶帝）親政之始，政治維新，一時督撫罔非正人。」<sup>6</sup>這些舉措在短期內緩解了各種危機。本書不僅以包世臣作為核心人物，也關注嘉慶帝在變革時期所做的努力。學者關文發和張玉芬對於嘉慶帝的「維新」之舉早有論述。<sup>7</sup>在此基礎上，2014年王文生所著《白蓮教叛亂和南中國海盜：清帝國的危機與改革》，<sup>8</sup>以及2015年米丹尼（Daniel McMahon）所著《再思清代的衰落：十九世紀初期帝國的能動性與邊境管理》，<sup>9</sup>都以嘉慶改革作為切入點，論述了關於國家能動性的議題。在米丹尼看來，很大程度上「嘉慶革新」並非朝廷衰落的表徵，而是王朝的機遇，由此而延長了盛世的餘暉。<sup>10</sup>

<sup>5</sup>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28，《仁宗睿皇帝實錄》（一），卷 56，嘉慶四年十二月甲申，頁 721。

<sup>6</sup> 昭槿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十，〈嘉慶初年督撫〉，頁 347。

<sup>7</sup> 參見張玉芬，〈論嘉慶初年的「咸與維新」〉，《清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頁 49-54。關文發，《嘉慶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 59-114。

<sup>8</sup> Wensheng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Crisis and Reform in the Qing Empire*.

<sup>9</sup> Daniel McMahon, *Rethinking the Decline of China's Qing Dynasty: Imperial Activism and Borderland Manag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sup>10</sup> Daniel McMahon, "Dynastic Decline, Heshen,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Xianyu Reform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ol.38, No.2 (June 2008), pp. 231-255.

第三，十九世紀上半葉士人經世致用的努力。包世臣自己很少用「經世」一詞，較多以「致用」或「有用」來表達他一系列的改革思想，而這些思想可以視作類同於與他同時代士人的經世致用思想。包世臣在諸多領域，如科舉、行政、財政、貨幣、漕運、農業、外交等方面均可被稱為「專家」，並發表相應的改革建議，尤其是他所提出的興修水利系統、改革漕運與發行紙幣等建議，正是對當時社會問題與危機的具體回應。以漕運改海運為例，包世臣的構想大大推動了道光初年海運的施行，不僅有效緩解了「道光危機」，<sup>11</sup>更直接實現了通過改革以推動「民富國強」的目標。因此，他也成為了十九世紀下半葉「自強、求富」運動的宣導者，乃至康有為和劉師培眼中的改革先驅。

近年來學界對包世臣的關注度與日俱增，也有更多人開始強調包世臣在他的時代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甚至把他視為宣導「商業自由主義」的先驅。但是羅威廉對包世臣這位十九世紀上半葉危機經歷者與改革建議提出者全面的思想研究，一方面為我們展現出包世臣強調朝廷放權地方，減少政府干預，發展經濟私有制的設想與努力；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包世臣反對發展對外自由貿易的觀點。實際上，一些激進的「保護主義」言論，出現在包世臣討論對外貿易的著作中。雖然包世臣贊同在官方管控下，發展清朝和中亞地區跨區域的文化交流，但是卻對開展一切海外貿易（「出洋貿易」），包括出海和東南亞及周邊地區的貿易，即「東南開洋」，持絕對的反對立場（頁 63）。因此，對包世臣的全面研究，既折射出乾嘉時期士人探求解決危機的努力，又凸顯了嘉慶時期及同時代改革思想的複雜性、多面性，更體現出這一時期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羅威廉對於包世臣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事例，說明處於十九世紀上半葉「衰落」過程中，士人積極參與改革，應對和致力化解危機。筆者認為，這種更加積極的視角，即強調十九世紀上半葉士人努力應對危機，

---

<sup>11</sup> 參見 Jane Kate Leonard, *Controlling from Afar: 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 1824-1826*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6).

以延長清朝在十九世紀的有效統治，不同於負面和消極的傳統觀點，是目前學界開展「乾嘉變革」研究的一條重要路徑。也許，掙脫十八世紀的束縛，將研究視野下移至十九世紀，跳出包世臣個人而關注同時代士人的經世致用思想，擺脫嘉慶改革的單一論述，強調乾嘉變革的大時代背景，才是本書更希望傳遞給讀者的主旨所在。